

朱光潜先生学术传记

商 金 林

一、家世及早年所受教育

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字孟实，笔名孟石、萌石、明石、蒙、石等。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安徽桐城双井村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祖父朱文涛是个贡生，和古文家吴挚甫有交谊，做得一手很好的八股文。父亲朱若兰，字黼卿，是个乡村私塾教师。母亲庄东宜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朱光潜兄弟三人，他居长，二个弟弟，一个叫光澄，一个叫光泽。生活尽管不富裕，但朱若兰以诗书自娱，倒也自得其乐。堂屋里张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绿水青山任老夫逍遥岁月，欧风亚雨听诸儿扩展胸襟”。这副对联不仅写出了家乡风物，写出了朱若兰的淡泊和开明的一面，也点出了朱光潜的成长与我们这个世纪的“欧风亚雨”密切相关。

朱光潜自幼聪颖好学。1903年，他六岁时成了父亲私塾中最年幼的学生，一直到十五岁（1912年）。读过的书主要有四书、五经、纲鉴、《唐宋八大家文选》及《古唐诗选》等。此外就是学习写日记，做八股文，以及策论经义等。日记和八股文的训练，触发了朱光潜读书的嗜好，对于他后来写作之条理分明，有很大的助益。

1912年春，朱光潜进入孔城高等小学读书。孔城高等小学很注重写作训练。朱光潜入学时已能写出通顺的文章，因为学业优异，只读了一学期就跳级考入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吴汝纶重视桐城古文，强调“朗读和背诵”，认为这样才能抓住文章的气势和神韵，便于学习作文。朱光潜“从此放弃时文，转而摸索古文”（《朱光潜自传》）。学欧阳修、归有光有时居然学得很象，特别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得益最多的是国文教员潘季野。潘是一位宋诗派诗人。在他的熏陶下，朱光潜对中国古典诗词养成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练就了一手好辞章。

1916年中学肄业后，朱光潜在桐城县大关小学当了半年小学教师。第二年，他雄心勃勃地报考北京大学，仰慕的是北大的“国故”，但因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18年，香港大学破天荒第一次委托北洋教育部从全国四所高师（北京、南京、武昌、成都）招选二十名师范生，朱光潜报名应试，得69分。名列第八。港大复试时因英语成绩差先入特设的大学先修班，1919年秋再试后，入教育系正式就读。

香港大学是一所英国人办的学校。朱光潜在这里广泛接触到西方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英国语言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课程，使他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并萌生了研究西方文化的意念。为了鞭策自己勤奋读书，朱光潜在寝室的墙上悬挂着著名书法家方槃君写的四个大字：恒、恬、诚、勇。这是他恪守一生的座右铭。他解释说：恒，就是恒心、毅力、忍耐、执着，一个人无论求学问还是做事情，都要有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恬，是指恬淡，简朴，清心寡欲，在物质上的追求少一点，在精神上的追求才会多一点；诚，诚恳诚实，待人处世，应该以诚相见，襟怀坦白，不能自欺欺人；勇，勇气，志气，治学道路以至整个人生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有

进取的精神，搏击的精神，怯懦和自卑是要不得的。港大四年，他取得了优异成绩，和同学朱跌苍、高觉敷一起赢得了Three Wise men（三个聪明人）的译号。1921年7月25日，朱光潜的处女作《福鲁德的潜意识与心理分析》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翌年4月，《进化论证》一文发表于《民铎》月刊。介绍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福鲁德的潜意识与心理分析》，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进化论证》，是朱光潜在港大时代主要的读书心得。朱光潜深有感情的说：港大的学习生活“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二、留学英法八年

1923年夏天，朱光潜结束了港大学习生活（获文科学士学位），先后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1925年春，朱光潜与匡互生、夏丏尊、叶圣陶、胡愈之、陈之佛等人集资在上海江湾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立达学园。1925年9月，朱光潜考取了安徽官费留英学习。他首先进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研修英国语言和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及艺术史等课程，指导他的三位导师是英国文学教授谷理尔生先生、哲学教授侃普·史密斯先生、艺术史教授布朗先生。在“洋导师”们的引导下，朱光潜由喜爱文学走向心理学，再由心理学走向哲学，最后走上美学之路。

1927年，朱光潜在爱丁堡大学心理研究班小组讨论会上，宣读过一篇题为《论悲剧的喜感》的论文，受到心理学教授詹姆斯·竺莱佛博士的嘉许，遂萌生了潜心撰写《悲剧心理学》的念头。

1929年夏天，朱光潜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时年32岁。这年9月，朱光潜转入伦敦大学文学院从事研究，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经常过海去学习法文和法国文

学。受巴黎大学文学院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的启迪，朱光潜开始酝酿撰写《文艺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派别》两部著作。

1931年，朱光潜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研究所边学习德语，边继续研究美学和心理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位于莱茵河畔，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母校，地方较为幽静，风景优美，通用法语和德语。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夏尔·布隆代尔教授的指导下，朱光潜于1933年春天用英文写成了《悲剧心理学》一书，并因此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夏回国。

在旧中国，留学生光靠官费是难以维持的，何况官费经常不发。朱光潜只好“靠写作来挣稿费吃饭”。他为挣稿费写的两部书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采用与朋友“吐肚子”谈心的方式，谈读书、谈作文、谈社会活动、谈恋爱、谈升学与选课、谈人生哲学、谈情与理、谈动与静等等，都是青年们关心或应该关心的事项。朱光潜以他特有的流丽的笔墨，娓娓而谈，处处打动青年学子的心坎。《谈美》，是朱光潜写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其旨趣在研究如何免俗。朱光潜真诚地相信，“美学”可以当作改造中国的“他山之石”，张扬自我和情感自由的唯心主义美学，对于改造中国是有益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于1929年3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立即风行一时，销行在三十版以上，青年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朱光潜由此赢得了“青年导师”的美誉。《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于1932年1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后，立即被评论界推崇为透彻、圆满、创造性地“介绍外国学说的一个好榜样”，广为流传。但朱光潜觉得这两部书是“通俗读物”，作为一个学者，固然要关心现实，不间断地抒写富有社会效益的“应时之作”，而更为重要的是锐意求新，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精心创作富有学术价值的“传世之作”。他把“通俗读物”的写作，看成是治学征程中的一种调剂

和娱乐。他提倡以“科目”或“问题”为中心读书，由博而约，由杂而专。他主张像打仗那样地去做学问。打仗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做学问要善于研究重大的科研课题，不能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地打“消耗战”。在英法留学的八年间，朱光潜咬准了五个目标，这就是撰写《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他的博士论文）、《文艺心理学》等四部与心理学有关的美学论著和一部《诗论》。

《变态心理学派别》写成于1929年春天，1930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朱光潜有感于心理学在当时还是一种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的学科，仅属待开发的领域，于是对于心理学各派都予以相同的注意，不分厚薄地介绍各派的主张，供国内读者初学。这是我国第一部客观的介绍近代变态心理学主要思潮的专著，是精心撰述的一册很完备、很有系统的好书。高觉敷在这本书的序文中说：“孟实先生虽算是文学和心理学间的‘跨党’分子，然而他在心理学上对国人的贡献，实超过于一般‘像煞有介事’的专门家之上。”他“第一个”介绍弗洛伊德的学说，“第一个”介绍“行为主义”；“第一个”评述考夫卡和苛勒的“完形心理学”，开了现代心理学探索深沉心理的先河。

《变态心理学》写成于1930年8月，1933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在《自序》里开宗明义的说：“近来我国研究心理学的风气很盛，而变态心理学一科至今还没有一部专书讨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朱光潜是针对变态心理学一科无“专书”可供研讨的“现状”，而奋然撰写这部“专书”的。这是我国当时除《变态心理学派别》之外，仅有的另一部论述变态心理学的专著。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是一部英文著作（朱光潜的博士论文），1933年3月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拉菲尔教授 (D.D.Raphael) 在1960年出版的《悲剧论》 (The Paradox of Tragedy) 这本书里论述悲剧快感、悲剧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时, 把朱光潜的论文作为涉及同类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来研讨, 肯定了朱光潜把悲剧与崇高感联系起来详加评述的功绩。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研究“美学”的起点, 在他的美学生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事隔半个世纪后, 这部书由张隆溪译成中文, 于1983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光潜为中译版加写了自序, 称该书是他的美学“处女作”。

《文艺心理学》, 是在英法留学期间写成初稿,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艺术学院任教时作为教材, 并作了修改和增补, 1936年定稿, 是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本讲科学的美学的书, 是我国最早问世的极少数的非常严谨的文艺理论书籍之一。朱光潜在《谈美·开场白》中说“在写《文艺心理学》时, 我要先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朱光潜在谈及《文艺心理学》的写作动机时说: 旅欧期间, 西方心理学的长足发展, 欧洲美学重视对审美经验作心理学研究的潮流, 促使他立志写一部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 (即《文艺心理学》), 而国内美学研究的稚嫩和贫乏, 更坚定了他到美学园地垦荒的志向, 誓做一个“国内仅有的研究科学的美学的人”。

这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基石是克罗齐的“直觉说”。朱光潜认为, 从康德到克罗齐这一脉相传的美学观点, 为自下而上的心理学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点, 这派观点代表着西方美学思潮的主流。又清醒地看出它在理论上方法上还颇多“罅漏”, 有不少论点与审美活动的心理事实相抵牾, 于是, 他援引布洛的“距离”说, 说明“直觉”产生的前题和条件; 引进立普司的“移情”说, 以展开美感中物我之间的双向关系, 而“直觉”本身, 则被看作是美感的起点。这种“补苴罅漏”的结果, 不仅补充了克罗齐的“直觉”说, 纠正了它的某些偏颇, 而且对审美经

验作出了更切近实际的心理学描述，对揭示审美心理的奥秘，也有“张皇幽渺”的功效。《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是朱光潜所赖以建立自己美学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文艺心理学》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代宗教说”以来，第一部讲得“头头是道，醅醅有味的谈美的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比较系统的美学著作。“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木”，标志着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而朱光潜就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八年的留学生涯中，朱光潜博览群书，拼命译著，尽力把西方各家各派的美学和心理学介绍到中国，“希望起一些启蒙作用”。他还初译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还以罗素的观点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战火焚毁。朱光潜的学术著作不仅以其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理论震撼着文坛，而且文笔流畅，文字幽美，将深奥的理论问题，出之以明白流丽的笔调，使一般知识青年都能了解而受其影响。他的著作和译作以行文的清新绮丽被誉为“美文”。

三、在北大、川大、武大执教

1933年7月，朱光潜结束了八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后，经武昌高师同学徐中舒介绍，结识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在读过朱光潜的《诗论》初稿后，胡适立即决定聘请朱光潜出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主讲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同期，他还在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应朱自清之邀）、北平大学（应沈尹默之邀）、中央艺术学院（应徐悲鸿之邀）、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他讲授的课程以其内容的精湛和通俗易懂，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的四年间，朱光潜一边讲学，一边对《文艺心理学》和《诗论》作了认真修改（《文艺心理学》由开明书店于1936年7月正式出

版；《诗论》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于1943年6月出版）。工余，朱光潜与胡适、周作人、杨振声等“京派”文人交往较多，组织“读诗会”，研讨系统的诗学理论；组织“中国风谣学会”，尝试“新诗民歌的诵读，以及将民间小曲用新式乐器作种种和声演奏试验”；主编《文学杂志》，重振“京派”的声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光潜应邀到成都出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学系主任，讲授莎士比亚及十九世纪英国散文等课程。在民族救亡运动的洪流中，朱光潜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与何其芳、卞之琳、方敬等人自费出版《工作》半月刊，宣传抗战，支持正义。1938年12月，朱光潜脱离四川大学，到四川嘉定的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主讲美学和英国文学。1942年，朱光潜出任武大教务长，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朱光潜撰写了《谈修养》（重庆中周出版社1943年5月出版）、《我与文学及其他》（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10月出版）、《谈文学》（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5月出版），经反复修改写成了《诗论》（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6月出版）。《谈文学》是作者“自己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它有时也为初入门者说法，有时也牵涉到理论”，既有一般文学与人生、文学的资禀、修养与趣味问题，也有文学创作中选择、安排、运思及修辞问题，还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体裁与风格、文言与白话、想象与写实的关系，这是一部“切切实实”谈“文学的修养”的书，深受文学青年的喜爱。《谈修养》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续作”，然而写得更用心，也更能看出步入“不惑之年”的朱光潜的思想风貌。

《诗论》是“五四”以来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诗学理论的专著，是我国现代诗学的一块里程碑。在三四十年代，朱光潜曾多次呼吁：“在目前中国，研究诗学似尤刻不容缓”，并为此作了不懈的探索。朱光潜说：《诗论》是他的“得意之作”。《诗

论》和《文艺心理学》这两部著作，都是在认真钻研、比较中西文化基础上，“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木”的重要成果。作者含辛茹苦十余年写成的《诗论》，理应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重要文献。

1946年冬，朱光潜重返北大，任西语系主任，翌年兼任北大文学院代院长。这一年，朱光潜筹组“西方语学会”，任第一届主席。1948年被遴选进北平研究院，为文艺组院士。

抗战后期，朱光潜曾有个短暂的消沉。1947年前后，随着国内形势的日趋明朗，朱光潜又恢复了旺盛的生命力，讲授英诗选读、英国文学、美学、翻译等课程，潜心于克罗齐研究。1947年11月，朱光潜翻译的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由正中书局出版。他为这部译稿写的序言，因文字太长，只好单另成册，定名为《克罗齐哲学述评》，于1948年5月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朱光潜通过研究克罗齐的全部哲学，对康德以来的唯心主义进行了一次“总检讨”，他详细分析了克罗齐哲学的历史渊源和基本内容，并提出十大疑难，对克罗齐及其整个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他在《〈克罗齐哲学述评〉序》中说：“作者自己一向醉心于唯心派哲学，经过这一番检讨，发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论的英雄的企图是一个惨败，而康德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一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心里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怅惘，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正因朱光潜痛苦地认清康德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一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感到惋惜与怅惘，于是不得不以补苴罅漏的方式来挽救这个惨败，也就埋下了日后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由。因为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建构出一套打破心物二元论的思想体系将把他带出“迷径”，“要真的绕出这个圈子，就非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照耀不可”（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可见，《克罗齐哲学述评》是朱光潜建国前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继《文艺心理学》怀疑和修补克罗齐到认真批判克罗

齐的一大转变。

四、新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52岁的朱光潜从此获得了新生，开始步入了后半生。他一直担任西语系教授，在阅读《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等马列著作的同时，于1949年开始翻译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1951年10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路易·哈拉普是侨居美国的犹太人，这部《艺术的社会根源》“是从马列主义观点出发，把文艺上一些活的问题提出，根据艺术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具体事实，详加剖析，然后得出结论。”他翻译这部书“觉得这是一个愉快的工作，不但从此对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有较深一点的了解，而且拿作者的问题和看法，来对照我们自己的当前一些文艺问题，也随时得到许多启发”（《译后记》）。从这些诚挚而热切的话语中，也可以想象建国初期“获得了新生”的朱光潜的精神面貌。

五十年代初，朱光潜主要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为了适应新中国文化建设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1956年，年已六旬的朱光潜从头学习俄文，他抱着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原版本和中译本对照着“死啃”，以顽强的毅力跻身于“精通俄文”的行列。短短的几年间，朱光潜翻译了《文艺对话集》（希腊 柏拉图著）、《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德国部分）》（苏联 伊瓦肖娃著）、《英国佬的另一岛》（萧伯纳著），修订并再版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1956年，朱光潜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57年春又参加全国文联和政协，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顾问；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通过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和新旧中国的对比，朱光潜心悦诚服地

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所能走的唯一道路”；一再说“我对于给我新的生命的党，怀着由衷的感激”；并且坚信他“性格”中的“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这些“优点”，可以做他的“新生”的“萌芽”。

五、从美学大讨论到《西方美学史》

1956年到1962年，全国开展了美学大讨论，朱光潜感到这是彻底清除自己思想上“陈年病菌”的绝好机会，于是率先写了一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表明要与“旧我”决裂，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投入到论争中去，希望能在这场论争中“进一步改造思想，肃清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一个知识分子的“潜力”。

在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诸如《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再答洪毅然先生》、《克罗齐美学的批判》等等，后汇编成《美学批判论文集》，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10月出版。

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怀着“相知恨晚”的“欣喜”与“悔恨”，在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了美学的许多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美是社会意识形态性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崭新理论，雄辩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建立在四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就是（一）感觉反映客观现实，（二）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三）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四）客观与主观的对立统一。“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一命题，批判并超越了“主观论”（“美是观念”）和“客观论”（“美是典型”、“美是真理的形象”）的“二元论”，

揭示了为“主观论”或“客观论”所忽略了的的美的深层奥秘，科学地阐述了审美活动的真实本质。

从此，朱光潜把主要精力用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介绍历史资料，系统研究西方美学史。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下，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于1958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北大哲学系成立美学教研室，朱光潜由西语系暂时借调哲学系，讲授《西方美学史》，培养青年教师。1962年，他应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邀请讲了三个月《西方美学史》，同年又接受高教部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委托编写《西方美学史》教材。他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仅用一年时间就写出上、下两卷本长达50万字的《西方美学史》，这是一部体系完整、内容详备赅博的大著。朱光潜说，他为了编撰此书，在搜集和翻译原始资料方面所花的功夫比编写本身至少要多两三倍。用意是要史有实据，不要凭空杜撰或摭拾道听途说。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美学史上自古希腊时期的美学，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十七、八世纪和启蒙运动的美学，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德国古典美学及其他美学流派，都作了切合实际的评述。它的问世，使朱光潜赢得了一代美学大师的赞誉。

六、1966~1976年间的遭遇和奉献

从1966年到1970年，由于社会政治环境所致，朱光潜先生的学术活动受到严重影响。1970年之后，处境稍有改善。

从1970年到1976年，朱光潜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又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找来英、德、俄、法几种文本和中译本对照阅读，发现译本中有不少地方尚须推敲，便随手写在书

页边上。最后，他把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正建议的六本书寄给了马列著作编译局，希望能为正确地传播马列主义贡献一份力量。二是全部译完了黑格尔三卷四本百万言的巨著《美学》。黑格尔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美学著作中的代表作，对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这部书是“值得细读的”。原文相当晦涩，典故很多，是一部很难译的书。中央领导同志曾支持朱光潜翻译这部美学名著。译本是根据1955年柏林出版的由巴森格重编的新版本，同时参照英、法、俄的一些译本，经过反复推敲，写了相当多的译注，说明他为何这样译而不那样译，以求精确。为了大多数读者的方便，朱光潜不仅对词汇和典故加以译注，而且对较难懂的章节提出简明的释意和提要，疏解深奥难懂的本文，提高可读性，引起读者研究的兴致。三是翻译了《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录》（197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西方美学著作中很有影响的一部作品。原著篇幅浩繁，涉及范围很广。朱光潜选择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关于哲学、美学、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理论部分，以及当时欧洲一般文化动态。行家们都说朱光潜的选译部分的确是这部名著的精华。

七、最后十年的冲刺

粉碎“四人帮”之后，朱光潜起早贪黑著书立说，翻译名著，“誓趁八十开外的余年，努力在自己毕生从事的美学领域里多出点添砖加瓦的微薄力量。”他还说，我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多‘吐丝’一日。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替人间增加哪怕一丝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也好。”他修订了《西方美学史》上、下两卷（1979年6月、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序言和结论部分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文艺是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观点，曾引起过讨论。他还翻译了莱辛的《拉奥孔》、维科的《新科学》，出版了《谈

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等专著。这十年中，朱光潜在教育领域不懈地驰骋，在学术上无止境的追求，耄耋之年还这样勇猛精进，在中外文化史上也实属罕见。

《谈美书简》（1980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美学拾穗集》（1980年10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朱光潜晚年的代表作。

《谈美书简》是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美学上一些关键的问题”反复研讨后，所得到的新认识的汇集，是一部系统的美学著作。这些“新认识”的精华是：（一）一定要把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放在首位，反复强调说研究美学如果不弄通马克思主义，那就会走入死胡同；（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人的整体性观点，给美学带来了深刻的革命；

（三）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有自己体系的。针对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美学有科学体系的观点，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比以往任何美学大师（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所构成的任何体系都更宏大、更完整，而且有更结实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发展线索；（四）马克思主义美学并没有穷尽美学的发展，美学还需借鉴历史上的各派美学的成果，并且应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继续探索新的问题，比如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人情味、美感中的心理与生理问题，文艺创作中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问题、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问题、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悲剧性与喜剧性，以及“偶然机缘”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作者都辟专章进行论述，重新认识，评价和阐释了一系列重大的美学理论。

朱光潜称《谈美书简》是一本通俗小册子，说“文革”后他的中心工作还是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摸索，《美学拾穗集》就是“对马克思经典著作”摸索的一个成果。书中汇集了他80岁（1977年）以后所写的论文、札记共十一篇，涉及美学的基本原

则及方法论问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评价问题。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两篇论文。为了澄清有关“异化”、实践观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美与美感、唯心与唯物的关系，这些全世界学术界都在关心和热烈讨论的课题，他重译了《费尔巴哈论纲》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私有制与共产主义》两大关键性章节，作了新的注释。朱光潜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实践的观点、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人是有机整体的观点、文艺具有社会目的及内在规律的观点等基本观点中，为自己的美学思想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他庄严地声明：“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高举“坚持马列第一义”的旗帜，在理论上匠心独运地为文艺创作“松绑”，为思想解放运动开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开放体系”。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敏锐地追踪着我们时代的步伐！

1980年秋天，朱光潜着手翻译维柯的《新科学》。维柯（1668——1744）是意大利哲学家，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先驱，是美学的真正奠基人。1984年春，《新科学》译著稿修订完毕，朱先生体重只剩七十斤，他患了疲劳综合症。为了想再活三五年，再翻译点书，这位嗜书成癖、嗜烟成癖、嗜酒成癖的老人，一切听从医生的吩咐，以惊人的毅力戒烟、戒酒，按时服药打针，练习写字，坚持锻炼身体，医生和护士都称他是“可爱的老小孩”。这一年，他撰写的《维科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他还抱病为民盟中央举办的“多学科学术讲座”撰写讲稿，同讲座班学员们见面并合影留念，满腔热忱地希望中青年接班人，发扬良好学风。1985年春天，朱先生的病情加剧。为了战胜病魔，他让家里人为他买一辆三轮车，由二个外孙拉着到西苑和圆明园观赏杨柳、桃花、田舍、湖水，希望“春”在美化大地的同时，也能穿透他寂寥的心灵，使他衰老的

生命之弦还能弹奏出美的音符。

八、潜德幽光，风范长存

1986年3月6日，朱先生终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海峡两岸同声哀悼这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中国荒芜的美学园地中拓荒耕耘的一代宗师。

朱先生的一生，是开拓进取，锐意求新的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为我们留下了七百多万字宝贵的文化财富。如果说王国维是把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个人，那么，朱先生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系统全面地把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创建了使之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的独特的美学理论，使美学在中国以科学的形态得以发展的最重要最有成效的开拓者。

朱先生的一生，是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一生。无论是在风光明媚的阳春秋月，还是在风斜雨横的严冬酷暑，也不管顺逆显晦，总是沉湎于学海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看风向，不人云亦云，不计较一时的得失，执著地探寻真理、憧憬未来。为人毫无世故气，为文毫无江湖气，在逆境中从未有过沮丧的情绪，在顺境中从不踌躇满志，这就是朱先生最可宝贵的人格和学格，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朱先生的一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他强调“基础”和“视野”。所谓基础，就是中国文学的根基要深；所谓“视野”就是眼界要开阔，要精通一种、二种以至多种外国语，能够从心所欲地阅读外国文学著作和学术著作，不能只看译作，嚼别人嚼过的甘蔗。他说衡量一个人外文水平的高下，有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请他把我国的成语译成外文。朱先生的“国学”根基很深，又精通英、法、德、俄四种文字。你说任何一句成语，他都能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准确，敏捷、富于创造性的对答如流。谈到治学的经验，朱先生强调要克服惰性，要“去懒”，

“要朝抵抗力最大的方向走”。他十分喜欢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池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把这首诗书赠给朋友和同学们，强调治学要有“源头活水”，强调美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经验。他经常引用孔子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始终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

乔行简是宋人非清人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杨殿珣先生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一版）著录宋代抗金名将宗泽之年谱云：《宗忠简公年谱》一卷，清乔行简编，清康熙刊《宗忠简公全集》本。按，乔行简，字寿朋，生于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卒于淳祐元年（1241），东阳人，绍熙进士，端平元年（1234）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二年为右相，三年进左相，嘉熙三年（1239）拜平章军国重事，著有《周礼总说》、《孔山文集》等，《宋史》卷四一七有《乔行简传》。其所编《宗忠简公年谱》一卷，清宗文灿辑，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刻的《宗忠简公全集》卷七有载。

· 龚剑锋 ·